

带头讲课，充分准备，对症下药，因人施教，讲究艺术

跟毛泽东学习怎么讲党课

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准备三天四夜 只讲了半天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

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学会看菜吃饭 量体裁衣

毛泽东在讲课时善于根据说教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

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有一次，在给人日夜校上课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话语，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掌握语言艺术 才能生动引人

毛泽东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



毛泽东讲党课，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欢迎。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

>>延伸

三会一课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定期上党课的相关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要求“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这是关于党的会议制度的最早规定。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过程中，强调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党员不但要承认党纲，更要“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

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流，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对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引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粗浅。

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育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提出：“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制定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作出的具体规定。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据《学习时报》）

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

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有时候，毛泽东夜间工作时间太晚，第二天不能准时到学校上课，学员们就排队来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处的小院子里，席地而坐，聆听演讲，认真记录。随着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大家都想亲耳听听毛泽东的演讲或报告，于是就开设了露天大课堂。延安城里抗大的庭院里，清凉山下陕北公学门前的广场上，以及桥儿沟艺学院的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方桌，放一个装满热水的搪瓷缸子，毛泽东站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演讲。说到激动之处，他往往双手叉腰，身体前后移动，甚至在台上来回走动，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听众们的心。（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毛泽东在抗大讲党课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备、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

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主席

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

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亲自来